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6)
1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3)
1.1.3 研究意义	(4)
1.2 文献综述	(5)
1.2.1 国外研究动态	(5)
1.2.2 国内研究动态	(10)
1.2.3 文献评述	(15)
1.3 研究设计	(17)
1.3.1 结构框架	(17)
1.3.2 技术路线	(19)
1.3.3 研究方法	(19)
1.4 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21)
1.4.1 可能的创新	(21)
1.4.2 研究不足	(22)
1.5 核心概念的界定	(23)
1.5.1 合作社	(23)

1.5.2	农民专业合作社	(24)
1.5.3	合作社公共服务	(25)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	(26)
2.1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定义、价值和原则	(26)
2.1.1	合作社定义	(27)
2.1.2	合作社价值	(29)
2.1.3	合作社原则	(31)
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来源、性质和可行性	(36)
2.2.1	来源：合作社价值和原则	(36)
2.2.2	性质：俱乐部产品理论的解释	(36)
2.2.3	可行性：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解释	(38)
2.3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内容、特性和功能	(42)
2.3.1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内容	(42)
2.3.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特性	(44)
2.3.3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功能	(45)
3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	(48)
3.1	公共服务效率的理论解释	(48)
3.1.1	公共服务效率的经济学解释	(49)
3.1.2	公共服务效率的管理学解释	(51)
3.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特性	(52)
3.2.1	公共价值属性	(52)
3.2.2	正外部性	(55)
3.2.3	区域性	(56)
3.3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内涵	(57)
3.3.1	“工具效率”和“价值效率”	(58)
3.3.2	“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	(59)
3.4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研究视角	(59)
3.5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61)

3.6 研究假设	(62)
4 区域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总体工具效率 ...	(65)
4.1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环境条件	(65)
4.1.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支持情况	(66)
4.1.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	(67)
4.1.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特性	(68)
4.2 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区域特点	(70)
4.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	(71)
4.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环境	(73)
4.2.3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74)
4.3 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指标体系的 设计	(76)
4.3.1 问题的提出	(76)
4.3.2 区域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依据与原则	(78)
4.3.3 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评价体 系指标设定	(80)
4.4 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指标体系验 证——基于浙江省 11 个市的数据	(82)
4.4.1 效率指数的计算方法	(82)
4.4.2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检验	(83)
4.4.3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效度检验	(84)
4.4.4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88)
4.5 本章小结	(89)
5 社员视角：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价值效率 ...	(91)
5.1 问题的提出	(91)
5.2 分析框架	(93)
5.2.1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社员满意度	(93)
5.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社员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	(94)

5.3	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社员满意度的总体分析	(97)
5.4	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101)
5.4.1	模型选择和变量说明	(101)
5.4.2	模型估计结果	(103)
5.5	实证结论与启示	(106)
6	组织视角：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综合效率	(108)
6.1	问题的提出	(108)
6.2	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0)
6.2.1	指标筛选	(110)
6.2.2	指标权重设置	(113)
6.2.3	综合效率指数的计算方法	(114)
6.3	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	(115)
6.3.1	样本数据来源	(115)
6.3.2	因子分析验证过程	(116)
6.3.3	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评估	(120)
6.4	综合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23)
6.4.1	分析框架	(123)
6.4.2	模型建立	(124)
6.4.3	模型估计结果	(127)
6.4.4	综合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131)
6.5	实证结论与启示	(133)
6.5.1	主要实证结论	(133)
6.5.2	主要启示	(134)
7	国外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策略的借鉴	(135)
7.1	国外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主要模式	(135)

7.1.1 “大农专业服务”模式	(135)
7.1.2 “中农专业服务”模式	(137)
7.1.3 “小农综合服务”模式	(138)
7.2 国外不同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策略	(140)
7.2.1 “自主发展型”农业合作社的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策略	(140)
7.2.2 “政府主导型”农业合作社的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策略	(144)
7.3 国外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启示	(151)
7.3.1 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重要外推力	(151)
7.3.2 工具效率优先还是价值效率优先取决于各国的社情和农情	(152)
7.3.3 法律保障农业合作社的特殊垄断地位	(152)
7.3.4 规范的治理结构防止农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目标异化	(153)
8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优化策略	(155)
8.1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155)
8.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双重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156)
8.3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代理人问题归因	(159)
8.3.1 中小社员作为初始委托人参与不足	(160)
8.3.2 核心社员作为中间代理人自治不足	(161)
8.3.3 政府部门作为中间代理人制度供给不足	(162)
8.4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基本原则	(163)
8.4.1 政府主导推进，合作社自主发展	(163)
8.4.2 重视价值效率，推进目标整合	(164)

8.4.3 依托农民发展, 带动农业发展	(165)
8.4.4 分类发展, 试点先行	(165)
8.5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多元激励策略	(166)
8.5.1 政府主导基础上的规制激励	(166)
8.5.2 中小社员赋权基础上的“问责”激励	(169)
8.5.3 合作社自治基础上的“声誉”激励	(170)
8.5.4 多主体协作基础上的长期契约激励	(172)
9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174)
9.1 研究结论	(174)
9.2 研究展望	(181)
参考文献	(184)
附录1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调查问卷(社员)	(199)
附录2 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调查问卷(负责人)	(203)

1 导 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当前“三农”政策的重点

改革 30 多年以来,虽然中央“三农”政策历经调整和变革,但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一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包括合作经营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现阶段“三农”政策的重点是为“精耕细作”的小农户家庭经营提供社会化支持和服务,加强双重经营体制“统”层次的功能。从 2013 年到 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①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宽服务领域,促进规范发展,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行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以农民社员为主体、以服务社员为宗旨的具有企业和共同体双重属性的特殊组织,具有扎根农村基层、熟悉农民偏好、降低交易成本等多重优势,是为小农户家庭经营提供系列社会化支持和服务的重要经营主体,其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的

^① 在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合作社”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简称。

地位和功能值得重点研究。

(2)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重构与合作社的发展空间

中国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结构严重失衡”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结构失衡中“弱势”的一方突出地体现为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2000年开始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在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同时，也截堵了基层政府的制度外财政，在“撤乡并镇、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精简机构、减少行政人员”的弱化乡村行政的改革思路下，失去了公共权力依托的原子化的农民不仅无法通过自主博弈达成理性的集体行动，反而因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行为而陷入“囚徒困境”，从而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短缺（贺雪峰，2006）。从2006年开始的多次中央会议和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村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均等化”目标作为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进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机制以应对政府一元供给的不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愿合作组建的基层组织，不仅能够向社员农户提供农产品营销、农业信息、农业科技等“工具性”公共服务，而且能够向社员农户、社区和社会提供提升农户民主意识、加强农户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增强社区社会资本乃至稳定农户家庭经营制度等公共价值意义上的“价值性”公共服务。因此，合作社因其独特的公共服务功能，在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合作社治理“乱象”与发展路线之争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中国合作社的数量增长极快，但“质量”状况令人堪忧，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势。一方面，合作社发展势头迅猛、数量激增。经农业部经管司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8.41万家，拥有成员数4776万个，其中农户成员数占79.2%。从合作社增长

趋势来看,2012年以来全国平均每月增长近两万家,堪称“火箭”速度。另一方面,合作社治理却是乱象杂呈:为获取各种政策收益,不具备经营实体的“空壳合作社”和“翻牌合作社”轮番登场,农户“被社员”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合作社治理格局中,“精英俘获”“大股独大”和“大农吃小农”等现象长期存在。合作社治理纷繁的乱象折射的是当前学界关于合作社发展的路线之争,这场路线之争的焦点包括:第一,合作社应该为谁服务?合作社应该是“资本的联合”,还是“人的联合”?其重点服务对象应该是专业大农,还是兼业小农?第二,合作社应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应重点开发合作社的经济服务功能,还是社会服务功能?第三,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合作社?是专业性合作社,还是综合性合作社?什么样的合作社才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农情的本土合作社?针对以上问题,开展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研究,重新审视合作社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对于认清合作社治理“乱象”和明确发展路线显得尤为重要。

1.1.2 研究目的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理论依据何在?其性质和功能是什么?第二,合作社的“公共服务效率”如何界定?其与合作社效率的区别何在?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何测量?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三,针对目前正在推进的合作社示范区建设,如何测量某个特定区域的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第四,作为合作社主体的中小社员,最需要合作社提供哪些服务项目?其满意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五,农业合作社发达国家在优化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方面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第六,针对中国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特殊性,如何提升其效率水平?

围绕以上问题,本研究的预期目标设定如下:

(1) 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

务的理论基础,澄清其性质、可行性、功能等基本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共服务效率。

(2) 构建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样本地区合作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区域合作社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比较提供参照标准。

(3) 从社员视角考察合作社公共服务满意率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社员对于合作社公共服务的满意率测量合作社公共服务的“价值效率”,借此考察中小社员需求,以便更好地确定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目标导向。

(4) 在重新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基础上,建立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完善当前的合作社效率评价体系尤其是示范合作社评价标准提供依据。

(5) 对国外合作社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进行总结比较,为中国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优化提供借鉴。

(6)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总结探讨中国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策略,为合作社新一轮的改革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1.1.3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第一,改变以往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研究中“重经营,轻服务”的倾向,紧扣合作社“服务社员”的根本宗旨,重点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共服务效率,借以拓展合作社效率的研究领域。

第二,根据工具效率和价值效率相结合、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综合效率”概念,并以此为分析工具检视当前合作社公共服务中的问题,为合作社新一轮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从区域视角、社员视角和组织视角等多个角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展开分层研究,借以丰富合作社效率的研究视角,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 实践意义

第一,本研究构建的区域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合作社公共服务“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别作为当前合作社示范区建设和示范社建设的基础评价标准,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第二,本研究从社员视角探讨了合作社公共服务价值效率的影响因素,对于了解中小社员需求,矫正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目标导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本研究基于中国合作社公共服务的特殊委托代理关系和国外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优化的借鉴,提出了中国合作社公共服务效率的多元激励策略,对于强化中国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合作社研究正式进入经济学视野始于20世纪40年代。学界一般认为合作经济研究始于Emelianoff和Enke。Emelianoff(1942)和Enke(1945)开始在合作经济研究中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运用微观经济模型对合作社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此后,合作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理论视角来看,国外合作社的研究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阶段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研究阶段大致从20世纪40—80年代,研究重点为合作社微观模型的设定和市场效率的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阶段大致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大量新兴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

论和博弈论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合作社研究领域之中,研究重点集中在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安排。

(1) 合作社存在的原因和组织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合作社就是一种营利性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或者企业的“联合”。合作社企业的效率目标是兼顾社员的生产剩余和消费剩余,同时追求社员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的结合(Enke, 1945; Emelianoff, 1942; Phillips, 1953; Helmberger & Hoos, 1962; Bateman, Edwards & LeVay, 1979)。Sexton (1986)认为,合作社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规模经济效益。公众支持合作社也大多是基于对合作社经济效率的认可,即合作社是一种对抗市场霸权的力量,它能提高不完全市场的效率,改善社会福利。

产权理论学者对于合作社存在的原因及组织效率持不同意见。一些产权理论学者认为,组织的产权所有者同时又是其生产剩余的索取者,可以有效提高组织效率。因此合作社应该被组建(Fulton, 1995)。但同时也有产权理论学者认为,由于合作社的产权界定模糊,资金的使用也有不合理之处,公平问题也难以很好解决,因此存在较严重的效率问题(Alchian & Demsetz, 1972; Fama & Jensen, 1983)。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合作社作为农民之间的纵向联合,具有同质性高、成员之间有信任关系等特点,因此能够有效解决农业资产的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因此合作社对于联合弱质农民的力量反抗市场垄断,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安排(Ollila, 1984; Williamson, 1985)。

(2) 合作社效率及其测量

合作社效率的内涵界定及测量一直以来都是合作经济研究的重点。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是国外相关文献关于合作社效率内涵界定及测量研究的两个基本角度。

合作社经济效率的研究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根据类

型进行合作社的效率研究,即学者们通常依据合作社的功能或产品特性将合作社分类,以探讨某种或某几种功能或产品类型合作社的效率水平。Ariyaratne et al. (1997) 对美国 89 家粮食销售和购买合作社的经济效率进行了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合作社的规模效率水平都高于其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据此,研究认为合作社要提高其总体效率水平,主要对策应是提高其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不提倡单纯依靠生产经营规模扩张的做法。Singh et al. (2000)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印度 65 家乳制品合作社为测量样本,研究发现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合作社效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第二种合作社经济效率的研究方式是将合作社效率与投资者所有企业 (IOF) 进行比较研究。例如,Porter 和 Schully (1987) 对美国牛奶合作社和 IOF 进行了较全面的实证比较。研究认为,由于技术、资源分配和规模等相关因素的制约,牛奶合作社比 IOF 的效率水平要低得多。Sexton & Iskow (1993) 认为,与 IOF 相比,合作社需要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游说及相关的非营利性服务。这些服务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合作社成本,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认为合作社效率低下,其结论显然是错误的。Svend & Christian (1997) 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合作社与 IOF 相比更有效率优势,有扩大规模的潜力。由此可见,合作社效率与 IOF 效率到底孰高孰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尚无定论,倾向性的观点是二者效率高低取决于社员特性、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例如,Hart & Moore (1996) 研究发现,在影响合作社和 IOF 的效率优劣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农户的异质性程度和市场竞争程度。在农户异质性较强和市场竞争较激烈之时,IOF 效率更高;而在农户同质性较强和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之时,则合作社的效率更高。Herbst & Prifer (2007) 的观点与前者基本相同,认为如果合作社能将集体决策的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所处的市场环境竞争程度不高,则合作社会表现较高的效率水平,反之,合作社则会表现出较低的效率水平。Chaddad & Cook

(2002) 研究也发现,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合作社将会变得效率低下,其中一部分合作社将会演变为 IOF。

相较于经济效率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合作社社会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对于合作社社会效率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Alfredo & Carmen (1998) 的研究。他们在构建的合作社模型中为合作社设置了两种角色:作为企业的角色和作为社会组织角色。他们研究了西班牙 Aragan 地区农业合作社的经济效率,同时提出了合作社社会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在 1996—2002 年间, Aragan 地区合作社的经济效率趋于下降,其原因在于合作社承担了社会功能,建议政府应加大对于合作社的补贴。为测量合作社的社会效率水平,他们设置了外部环境、社员参与、生产经营过程、民主、沟通等评价指标,认为这些指标变量与合作社的社会效率水平之间呈正向关系,合作社的社会效率源于民主、公平等社会价值,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是合作社价值所在。

(3) 合作社效率的影响因素

合作社效率与诸多因素相关。国外已有文献对于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合作社规模、合作社内部治理和合作社外部环境三个方面。

第一,合作社规模对效率的影响。

众多学者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效率。Ariyaratne et al. (1997) 采用 Tobit 模型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 89 家农业销售与农场供应合作社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合作社规模对合作社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越大,合作社效率越高。Areas & Ruiz (2003) 以果蔬合作社为例,研究认为,规模大有利于合作社实施差异化营销,因而能实现更高的效率水平。Hailu et al. (2007) 通过对加拿大合作社的研究发现,合作社规模对效率的影响与合作社经营的产品类型相关。

第二,合作社内部治理对效率的影响。Krasachat & Chimkul (2009) 认为,合作社成员培训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来提高合作

社效率。Sexton & Iskow (1993) 认为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内部因素主要有组织、财务和运营, 其中组织因素包括成员特性和决策机制等。与此类似, Chris et al. (2001) 将影响合作社效率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 合作社原则因素、组织构成因素和经营服务因素。其中, 合作社原则因素主要指合作社对于社员民主控制、盈余按惠顾额返还等基本原则的执行情况。

第三, 合作社外部环境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外部环境中对合作社效率影响最大的是政府支持, 众多学者均通过研究发现了政府支持对于合作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 Krasachat & Chimkul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合作社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同时政府信贷政策对合作社效率有影响。Ariyaratne et al. (1997) 和 Galdeano - Gomez et al. (2006) 的研究均发现政府支持力度越大, 则合作社效率越高。

(4) 合作社的治理与激励

国外学者关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委托代理视角、交易成本视角和博弈论视角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 涉及的主要治理问题包括产权结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第一, 合作社的产权结构。Shaffer (1987) 认为合作社中的契约关系与 IOF 中的契约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首先, 从合作社有关内部事务的契约来看, 社员的生产决策是独立的, 合作社不能通过契约进行控制。其次, 从合作社有关外部事务的契约来看, 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契约是随机的或者不确定的, 利润分配等问题无法通过契约说明, 而只能依赖于合作社的市场盈利情况。与 IOF 相比, 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合作社能够通过社员联合的方式分担市场风险, 也使看似松散的契约关系变得稳定, 是合作社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还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合作社不完全契约关系存在的问题。如 Hart (1995) 认为, 不完全契约使合作社的产权比较模糊, 导致其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复杂, 明确界定剩余索取权是合作社治理的关键所在。

第二，合作社的决策和监督机制。对于合作社的决策和监督问题，Staatz（1987）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即伴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张和合作社异质性的增强，管理者对合作社原则和价值的认识出现偏差，普通社员角色分工模糊且监督意识和能力普遍较弱，这些因素都使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其代理人问题与其他组织相比更加易发和突出，因此监督 and 激励都显得更加困难。Hendrikse & Veerman（2001）认为，经典合作社“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在现实中容易演变为少数代理人控制，这是合作社需要解决的主要决策问题。对此，Condon（1987）建议通过引进外部理事机制来解决合作社的代理问题；Karantininis & Zago（2001）则建议通过激励高效率的社员来减少合作社的代理问题。

第三，合作社的激励机制。与合作社效率直接相关的治理问题是激励问题，从根本上讲，合作社激励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提升合作社的效率。Hueth & Borgen（2003）对于合作社激励问题的总结比较有代表性，他们把合作社的激励问题归为两类：一类是投资激励，包括如何解决公共产权中的“搭便车”问题、如何解决短期行为问题等；另一类是决策激励，包括如何解决少数人控制问题，如何解决盲从问题等。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学者们提出了完善契约关系和加强对核心社员的激励等策略。例如，Royer（1999）认为，合作社由于“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的限制，无法采取与股份制企业一样的股权激励方式，难以有效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应探讨建立适合合作社的股权激励机制；Fulton（1995）认为，完善产权结构是减少合作社代理问题的重要策略，特别是要强化对于合作社核心社员的监督与激励；Cook（1995）同样认为，合作社社员分化必然会增加代理成本，产生内部治理问题，因此应建立以提高核心社员积极性为主的激励机制。

1.2.2 国内研究动态

国内合作社相关研究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大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 90 年代中期, 当时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村改革之后出现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股份合作组织以及社区合作组织等几种合作经济组织。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合作社经验并且评述中国合作社历史, 较多体现在阐述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 并大力倡导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同时, 从这一时期开始, 介绍合作组织理论和合作经济理论的著作开始陆续出版 (徐更生、刘开铭, 1986; 米鸿才, 1988; 陆文强等, 1988; 蒋玉珉, 1989; 张晓山、苑鹏, 1991; 杨坚白, 1992; 王恒壁、王殿祥, 1993; 姚监复等, 1994; 樊亢、戎殿新, 1994; 俞家宝, 1994)。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7 年前后, 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合作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制度特征、运行模式、运营效率和发展思路等问题, 对于国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合作社理论的引入和应用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洪远朋, 1996; 魏道南、张晓山, 1998; 丁为民, 1998; 陈锡文, 1999; 范小建, 1999; 冯开文, 1999; 冯雪珍, 2000; 黄祖辉, 2000; 国鲁来, 2001; 应瑞瑶, 2002; 刘承礼, 2003; 傅晨, 2003; 徐旭初, 2005)。

第三阶段从 2007 年至今, 国家—农民关系, 尤其农民—土地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中央取消农业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为契机, 合作社在农村“双层”经营体系中的地位和社会功能、合作社的制度边界和现实约束、合作社的政策选择与发展路线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除了经济学者之外, 来自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从合作社研究找到了相应的议题, 合作社研究跨学科趋势日益明显 (仝志辉、温铁军, 2009; 潘劲, 2011; 唐宗焜, 2012; 邵科、徐旭初, 2013; 贺雪峰, 2013)。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议题: